

# 期待审计报告 促预算制度尽快完善

社会分层与社会欠缺公正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极大影响。社会学家李培林近日撰文称,调查显示,本土认同自己属于中层的人还不到40%,认同自己属于中下层、下层的人占了将近55%,全世界都没有像这样的调查结果。李培林认为,这种现象可概括为“阶层认同偏下”。(6月25日《北京日报》)

## “阶层认同偏下” 疑似伪问题

在现实语境下,较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所谓橄榄型,不过是个形象性的比喻,即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这样的社会结构意味着,极富裕的两头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对很大。无疑,橄榄型社会比着贫富两极对立的社会稳定得多,也和谐得多。在橄榄型社会里,由于两头小中间大的因素,使得整体人群有一个连续性的排列,只要个人肯做努力,每个社会成员似乎都能找到向上流动的路径。

每个人都有一个阶层认同问题,都会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位置产生感知。也就是说,你有什么财富,你有什么生活机会,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会心知肚明。一般情况下,你是个穷人,不会把自己看成个有钱人,你处在富裕阶层,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个穷人,但实质上你还是富人。

本土出现“阶层认同偏下”问题,是件很蹊跷的事情。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不公平,由于生活机会的不平等,人们触目所及,社会所呈现的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劫掠成性,不断地将利益地方化、个人化、最大化,使本该被更多人分享的社会发展成果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因而,“阶层认同偏下”的可能性是:更多的人本身处于社会阶层的下层,而不是认同出现了偏差。

可以说,所有社会都是介于开放和封闭之间。它们都包含一些自致地位和先赋地位。在社会学的概念里,凡是能通过努力,通常是竞争,所获得的社会地位就叫做自致地位。而那种根据超出个人控制范围的标准来指定的社会地位就叫做先赋地位。先赋,顾名思义,就是先天赋予的,通常是出身、年龄、性别等,具体到现实层面,就是拼爹或拼干爹,就是“我爸是李刚”。在一个社会里,先赋地位太牛了,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社会阶层日益固化,贫富差距愈加悬殊。

中间阶层总体比例较小是个现实状况,而且,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表现为你是哪个阶层的人就是哪个阶层的人,改变的可能性极小。“阶层认同偏下”疑似伪问题,中产阶级人士,非得将自己看成中下层乃至下层,这种非理性的认同冲动从何而来?这种认同冲动利在何处?这么说吧,即使处在中产阶级的人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也犯不上硬把自己说成是社会的下层。这是不是反映了中产阶层的某种集体焦虑?现阶段,收入分配问题在本上一直就是个大问题。有一个现象很突出,就是各利益群体都认为现行制度对自己不公,都有意见,都牢骚满腹,都有各自似乎有理的具休说辞。不知道改变这种状况的出路何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调和这种矛盾,需要智慧,需要理性的意见表达,更需要合理的制度安排。 今语

公安部计划修改驾考规则,“过井盖”“过单边桥”等项目可能被取消,同时增加模拟高速、穿隧道、临水悬崖、湿滑路面及连续急转弯等项目,以强化驾考的实际性。

## 修改驾考规则 贵在严格执行

驾考是防止“马路杀手”的源头环节,立法规定驾考这样的“准入”机制,目的是在公民驾车的行为能力上设定门槛,以确保行车安全。

但对很多“过来人”而言,开车的经验往往是在路上“蹭”出来的,很多新手的驾驶技能,是在交通事故的“吃一堑长一智”中慢慢练习而成。这或许与驾驶的经验积累相关,但一定程度上与驾考这根“指挥棒”的作用密不可分。驾考规则科学与否、实用与否,影响着驾校学员日后的实际技能。根据社会发展情况,针对现代人的驾驶习惯和道路情况,适时修改驾考项目,进而调整驾考培训的内容及效果,是提高考生驾驶技能的重要途径。

表面上看,“过井盖”等项目的取消,似乎降低了驾考难度,但由于这样的技术考核难度偏大,实用性不强,如此还不如正视客观实际,设计应用性强的考试项目,比如高速模拟驾驶、侧方停车、坡道起步、直角转弯和曲线行驶等,让学员真正学到实用的驾驶技术。可见,此次驾考规则的修改,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科学性、实用性,方向值得肯定。

当然,诸如理论考试分两次进行,“新手”上高速必须“老手”陪,这些拟修改的“新规”是否妥当,还有待论证。高速行驶车速快、危险性大,有“老手”陪同理论上可以起到指导作用,但其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如何实现严密监管,都需要进一步考虑。

规则的良好设计是确保提高技能、实现交通安全的前提,但有了良好的规则并不一定能起到有效的“删选”作用,如何防止“二把刀”蒙混过关,离不开对规则的严格执行。正是在这个环节上,现下藏纳于各个城市驾考中的各种潜规则,最是让人担忧。防止潜规则蚕食驾考公正性,防止拿到驾照的人开不好车,还需要大力整饬驾考秩序。

由此,严把驾校考试关,不仅要科学设计考试项目,提高考试标准,更要严格执行考试规则。在加拿大,路考时间至少45分钟,法国、英国的路考一次合格率为30%~50%。此次修改拟增加考试里程数,如何防止驾考过程中“偷工减料”,对考官如何进行有效充分的监督,同样值得关注。 傅达林

6月27日,刘家义审计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2011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报告显示,发展改革委归口管理的中央本级基建支出,年初预算细化到执行率仅为47%,未达到75%的要求;财政部报告2011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时,少报19.22亿元超收收入安排情况;去年1460.24亿元中央部门支出预算中,有212.87亿元(占15%)当年未执行。

其实,翻阅这份审计报告,不难发现,报告所披露的多个问题均与预算制度相关。审计报告已经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包括健全统一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切实将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超收收入和重大预算调整事项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逐步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等。

这些建议也与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正在审议的预算法修改所主张的“预算完整、公开”等内容相呼应。根据审计报告发现的问题,以及报告

所提出的建议,着力于预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其价值远远超过对具体问题的纠错与整改。

审计,说到底就是关注纳税人的钱花得正确不正确、值得不值得、效果好不好。可是,这些年来,报告年年做,问题年年有。之所以会如此,很大程度上与当下预算制度的不完善有关。

预算不完整,预算编制不够科学、细致,预算执行过程中过于随意、不够透明,不只是让很多民众直呼“看不懂预算报告”,也是诸多违规问题的根源。比如,财政部报告少报19.22亿元超收收入安排情况,显然和超收收入能否全部、有效纳入预算管理有关。近年来,每年财政超收资金都不是小数。去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万亿元。尽管,关于财政超收收入如何使用有制度规定,但是,一笔2万亿规模的财政收入,怎么花的,应该接受更多监督,让公众看得见。

另外,去年中央部门15%的支出

预算没有“花完”,值得赞许的是这表明“突击花钱”的现象少了,但是也同时说明预算编制环节存在问题。当然,预算资金未执行有些是因外界情况有变,可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也与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细有关,编制不细,一些部门就容易怕钱不够花而给部门预算“注水”。

预算编制环节不够科学严谨,到了执行环节,也就难免会导致预算调整。比如,审计报告发现,2011年,财政部将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预算中的“落实教育规划纲要补助经费”70亿元,调整为高等教育支出。这或许就应该看做是重大的需要报告的预算项目调整。所以,建立政府财务报告制度,也是对现行预算调整机制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审计监督的效果非常明显。而有些问题“久审不治”,治本之道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预算制度,需要从最基础的细化预算编制开始。

新欣

## “雅贿”经济催生赝品火爆



据羊城晚报报道,近年来,社会上的贿赂方式又产生了一个新变种——“雅贿”。行贿人不再送官员真金白银、豪车豪宅和权证,改而送名家字画、珍奇古玩等,由于“雅贿”需求的不断膨胀,现在社会上已形成一个产业链。在这个链条里,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相互依存,各谋好处。

即使是仿字画,在“雅贿”经济中一样是“香饽饽”。一个商人在北京一个中等拍卖公司的画作拍场上,一口气就拍了300幅画,全部是仿画。

一位博物馆的书画专家则告诉记者:“他曾经应邀为一位领导做鉴定,其中两幅画被鉴定为现代复制品。那位领导不愠不怒。半年后,两幅画竟然出现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拍场上,成交价100多万元。”

对于一些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说,古玩字画的“真假”还真不是问题。赝品不出,自己欣赏把玩不失附庸风雅;被识破,也不愁找不到下家买单。权力,才是赝品真正的附加值。不收真金白银,青睐古玩字画,说到底还是受贿是犯罪,国法难容。赝品火爆自有市场法则去管理规范,“雅贿”泛滥则需对官员权力有效约束。反腐敢打“雅贿”,不能手太软!

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 南京协管 将摊贩踩在脚下

据龙虎网6月26日报道,南京一城管将摊贩踩在脚下。对此,南京建邺区兴隆街道城管科的回复是:“该执法人员是协管,是不小心失足踩到摊贩的。”目前城管科已对该名协管队员做了处理:“扣除当月考核奖金,目前在岗,同时也会加强对队员的教育,做到文明执法。”

【点评】

城管因执法问题被网上围观,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值得担忧的是,城管工作的媒介素养确实需要提高一下了。什么叫“失足”?怎么又是“协管”?如果执法本身没有问题,仅仅是“不小心失足踩到摊贩”,那对这位协管的处罚可就是太重了。事件到底是怎样的?希望给出真相。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 一卡通巨额押金藏着多少秘密

《中国青年报》报道,据统计,自2000年至今,我国城市交通领域一卡通累计发卡量突破1.8亿张,巨额押金及利息去向何处,一直备受关注。

让人想起“三桶油”的炼油亏损说,结果当然是换来了巨额的财政补贴。

可是,一卡通的制作成本真那么高吗?新华社记者今年3月调查发现,许多厂商的制作报价并不高,“如果是1万张的话,报价是6.5元,百万张的话肯定会低更多”。为何一卡通的成本却需要20元?原因在于“全北京只有一家公司有资格做,其他厂商想做也做不了”。

而且,技术要求相差不多的卡通,为何不同城市押金收费各异,有的甚至相差一倍?比如北京一卡通押金为20元,而同样由这家公司负责封装的山东济南市公交IC卡,只收10元押金?再如西安“长安通”押金为18元,南京“金陵通”押金为30元……不同

的押金收费标准,是否在印证着一卡通的乱收费行为?

作为公共事业,一卡通公司本不该刻意混淆成本和押金的区别,从而为自己的乱收费寻找借口。而应让持卡人知晓,这20元押金里究竟有多少是制作成本?又有多少是其他成本所需?一卡通的巨额押金和利息去向何方?这些都不应成为地方和企业的糊涂账。

反观香港的普通八达通,若在租用不足3个月内退出,只需扣除9港元的手续费,若超出3个月则免手续费,并退还全部50港元押金;若八达通遭人为损毁,在退还时扣除30港元的成本费。但无论何种情况,只凭八达通卡即可很方便地退换,根本不存在押金发票、收据一说。为何我们一定要为退换卡设置各种障碍呢?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此举是否借机私吞押金?本应是便民公共产品的一卡通,在押金问题上到底“卡”在哪?值得深思。 李龙

在香港廉政公署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施祖祥眼里,“零容忍”是一种态度:“贪污就是贪污,小也是贪污,大也是贪污。”廉政公署前副专员郭文纬也曾表示,无论是大贪还是小贪,“100元、10元,甚至1元都要处理”。(6月27日《中国青年报》)

## 像香港那样 对腐败“零容忍”

据说,40年前的香港,也是腐败猖獗,贿赂公行:建筑公司向售楼人员行贿才能拿到入伙纸;饮食店必须向有关部门派钱疏通才能取得经营牌照;就连着火时都要按规矩给消防人员“开喉费”。

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开始肃贪反腐,用了不是很长的时间,便把一个个腐败重灾区变成清廉指数排名居前,出现了公职人员“不愿贪、不敢贪、不能贪”的廉政局面。

香港的反腐成果不是传说,它戳穿了腐败不可治、将长期存在、必须适度容忍等等荒唐谬论。而“零容忍”所证实的一个逻辑则是,反腐的成效首先取决于一种态度:诚意、决心。也就是说,如果官方对肃贪反腐有诚意、决心极大,应该没有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而对腐败的容忍度,则最能检验反腐诚意与决心;一元钱也不

许贪,伸手就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容忍度肯定比重复一万次狠话管用得多。

在我们这里,关于腐败与反腐的情况,官方与民间的口径相差很大。比如财产公示,究竟该不该立即出台,官方与公众的观点也大不一致。实质问题,其实就是容忍度上的分歧。再比如,一些卖官者落马了,买官者却个个安然无恙,官帽照戴。吃拿卡要、滥发公款,吃空饷,当媒体曝光激起众怒了,也不过是退钱了事……如此说来,究竟是反腐不易,还是诚意不够、决心不足?

“零容忍”是一种态度,什么时候我们这里肯一元钱也是贪污,要下课、丢饭碗,腐败形势或许会是另一种情形。当然了,前提是谁来监管;自我监管、自说自话等等恐怕还是不行。但这是又一个题目,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马涤明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有较大争议的“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写进了草案。(6月27日《新京报》)

## 慰藉“空巢老人” 功夫在立法之外

“常回家看看”的确不具有可操作性,但是写进法律并不会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事实上,其面临的成最大问题是法律所宣示和倡导的这种价值取向,如何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依然秉持将“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说明对现实生活中“不回家看看”的现象感到异常焦虑。

虽然可以对“常回家看看”进行宣示性规定,但法律的作用也仅仅限于宣示性,决定了这样的义务只是道德义务而非法律义务。法律规定的这种“无奈”是一种必然,因为法律只能是底线的道德,更多道德义务的履行需要靠社会舆论和环境去引导。

不过,需要澄清的是,在“常回家看看”作为一种道德义务的语境下,“不回家看看”并不意味着道德滑坡。需要子女“常回家看看”的“空巢老人”和需要父母“常在自己身边”的“留守儿童”,他们的弱势不一定来自亲情的淡漠,而是社会的巨大变迁。

人口的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一对年轻的夫妇要面对4个老人和1个孩子。作为履行“常回家看看”道德义务主体的年轻夫妇,其最应该履行的是供养家庭生存的义务。当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生存的压力一股脑儿地袭来,这些就足以让人应接不暇时,精神上的慰藉其实是一种奢侈品。“常回家看看”,与老人共享天伦之乐,不仅是老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年轻人的精神需要。只有社会不断地创造条件,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再总是感受到生存的压力和焦虑时,精神诉求的满足才不会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 志灵

6月26日,北京二中院开庭一审诈骗案。被告人王某自称是高干子女,以能够低价买到房和车为由,伙同朱双双先后骗取文体明星邹凯、杨威、杨云、罗雪娟等30余人,共计人民币5800余万元、港元228万元。(6月27日《新京报》)

## 若任潜规则盛行 谁都可能成受害者

我们没有资格嘲笑杨威们。扪心自问,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人没有主动或者被动地潜规则过?孩子上学,求职升迁……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无力感,不走潜规则,基本上是办不成事。奥运冠军算得上是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完全有能力也有义务按照社会的基本规范行事,但为何连他们也难以抵御潜规则的诱惑呢?

我想,除了人皆有欲望这一人性本能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潜规则确实像瘟疫一样,若不加以打击,则会无孔不入。通常来说,潜规则是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一种屈从,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潜规则不再局限于强者与弱者之间,也不再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的无奈之举,而是已经成为一种人际交往的重要内容,甚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毫无疑问,这是社会伦理底线的一种

沉沦。二是潜规则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感。当被告人王某自称是高干子女,并放出“能低价买房”的诱饵,各路明星蜂拥而至的时候,他们之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而是视之为对自己社会身份的一种肯定,甚至是某种优越感的体现。因为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能进入这个圈子,进入这个圈子,才能获得相应的资源……当潜规则不再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是争相追捧的对象,这种价值观的扭曲无疑是最令人担忧的。

这就是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也许你侥幸地躲过,但总有一天你会成为那个不幸者。一个社会若想正常运转,离不开基本的制度规范和道德伦理的约束。倘若社会秩序失范,人人都依潜规则行事,那么,谁都有可能成为潜规则下的受害者。 吴龙贵